

# 对环境立法诸要素的经济分析

顾 尧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 要:** 环境立法是环境法体系中一个基本问题, 也是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程度的评判标准。针对我国环境立法相对完备, 而环境问题却层出不穷的现状, 以经济分析作为考察手段, 对环境立法的诸多要素有选择地进行了重新研究, 希求能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 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 环境立法; 本位; 证明责任; 权力配置

**中图分类号:** D92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009(2007)11-0224-02

肇始于 1973 年的我国环境立法工作几乎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同步, 明显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法哲学、实证法学理论的涌入以及法的移植技术的日臻成熟, 我国环境立法的速度也和其他重要的法律部门一样, 给人以应接不暇之感。但与此相对的却是, 淮河全流域的污染、长江源头冰川缩小、黄河断流、沙尘暴肆虐等见诸报端的报道令人眼花缭乱。一部完善的法律会因为司法与执法环节存在的问题而在实践中歪曲了法的本意, 但如果一部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依据, 那么, 再高超的司法与执法手段也不足以修正衡量标准自身的瑕疵。对于蓬勃发展的环境立法发展与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趋于同步的悖论,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反思与讨论已是汗牛充栋。基于对法律行为的经济分析理论的认识, 选择这一理性分析手段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宪法要求、证据责任分配、权利规则设置、行政权力和理化等诸多要素有选择地进行阐释与价值评判的信心, 望能置喙于我国的环境立法工作的大讨论之中。

## 1 环境立法对宪法依据要求的经济分析

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通过数年来立法者的不懈努力, 调整更为微观的环境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不断被创设并完善。法律体系结构日趋合理使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的法理基础得到了充分的夯实。这一环境法学界通说之于环境立法实践似乎具备了独立的条件。但如此热闹的环境立法于普通社会公众对于环境法不知所云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从环境法的外观表现考察, 它似乎距离社会公众的生活尚远, 不足以使我们以“狼来了”的思维去强调对其的重视。但事实上却是普遍的社会公众不知悉自己所享有的环境权利致使无法对破坏环境、侵犯环

境权利的施虐者寻求制裁与维权的救济途径。而被法律制裁(如行政处罚)的行为人数量远大于环境侵权所引发赔偿诉讼的被告数量的现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欠缺的就是根本的环境维权意识。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体现的是国家的最高意志和最终目的。虽然更多地只是规定了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 但也正是这些原则指引了其他法律的立法方向。环境立法也概莫能外。但纵观我国 1982 年宪法以及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的四个宪法修正案, 都没有将环境权规范到人权保护的高度, 这就必然降低人们关注它的可能性。从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作如下分析: 作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如果没有其权利被侵害的情况将不会花费任何成本去收集有关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信息。但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 将有可能支付一定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去收集法律救济的相关信息。因为它将估算出这些成本的付出必定小于依据这些信息所能得到的权利补偿收益——权利的补偿收益只是使原来受不法侵害的权利恢复了原状, 没有产生任何溢余性质的收益。所以补偿收益并不是真正经济利润意义上的收益, 因此收集信息的成本对其来说还是一种额外的损失。但人们依然对此我行我素的原因在于, 人们在维护人权的诉讼中都存在着超过其受损害部分更多赔偿额的期待利益, 即人身权利是无法以货币价值衡量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积累的经验对受损害的权利补救范围的现实货币价值的估算形成内心认同。一旦判决结果支持了这一期待利益的实现, 则成本的先行支付将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必要的。将环境权利作为人权保护的范围写入宪法, 将使收集信息的成本降低。首先, 因为人权意识的强化, 人权思想的内容与范围将成为社会常识的一部分而广为流传, 不但解决立法者关心的法的公示性与公众知悉之间的连接问题, 节省了为实现社会公知的目的付出的新法培训成本, 而且使得需要这一信息的收集者将更有可能付出更少的成本得到这一信息; 其次, 单纯以观察者的身份从法的适用

**作者简介:** 顾尧(1977-), 男, 东北林业大学 2007 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现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收稿日期:** 2007-08-01

中得出法的本质内容的相关信息,不但需要观察者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而采用上述立法方式则这种言简意赅的表达将直接传递给观察者,其时间成本的降低也是显而易见;再次,作为因侵害环境权利被法律制裁的责任者或者认识到环境权利已经上升到人权的保护高度,就将重新核算他的侵权成本与收益。传统的环境侵害一般只包括显性的、现实的损害需要给予赔偿。而人权的损害则包含二大部分,身体损害、精神损害。责任者就是因为意识到其侵害环境权利所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在人们环境权利保护意识尚未觉醒而只有寥寥无几的赔偿诉讼所付出的成本,才敢于肆无忌惮地继续侵害环境权利。一旦环境权利以人权的形式出现,除了更多的诉讼结果的不利益出现以外,精神损害赔偿将成为受害者最为重视的部分,也是其获取更多期待利益最具有操作性的空间。

## 2 环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经济分析

现主要探讨社会公众对于责任者侵害环境权利的诉讼证明责任。该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我国司法解释规定为:“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一般而言,被侵害的社会公众相较于责任者(基本上是生产型企业也包括一定数量的服务性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而这一规定所体现的精神恰恰印证了这一结论。在我国环境侵权救济程序现状中,不是健讼而是贱讼。人们的维权意识普遍不强。如果要求以通常的民事诉讼证明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来分配环境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将使弱势一方的受害者无力收集确凿充分的证据或者欠缺相应的激励机制去完成这一成本颇高的收集证据行为。且先期投入过高成本去期待一个不确定有利的诉讼结果,无疑使这类诉讼的受害人丧失诉讼的热情,进而导致立法保护在现实中落空。反观被诉一方,由于其在生产过程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是完全基于其意思表示进行并为其所能控制,收集相关证据的成本对其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有利于控制其诉讼成本。综上所述,环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为双方当事人以一个较低且更易于接受的诉讼成本提供了保证。主张者可以以一个较低的诉讼成本去期待一个相对较高的补偿收益和额外的不确定收益,自然也就产生了一个积极行使诉讼权的激励机制。而作为被诉方,其工业生产与服务本身就高于普通社会公众占用了更为大量的公共物品——环境资源,并从中牟取高额收益。相对于较高的环境收益,较低的诉讼成本是其所应当承担并有能力承担的。况且直面如果其不承担诉讼成本将导致诉讼结果的不利益,也存在着一种激励机制促使他情愿承担较低的诉讼成本。

## 3 环境权利设置规则的经济分析

经济生产活动乃至整个人类的社会活动都依托于环境而不停地向前发展,但当意识中那种对环境资源无

限性的印象倏地转变为稀缺的市场资源配置品,传统的私权绝对化观念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土地为例,土地的所有者对自己的土地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进行增殖活动并可以反复地、非保护性地使用,最终导致土地板结、沙化,彻底丧失其使用价值。这一用尽(消费)自己所有权的的行为则不具有正当性。土地的所有者只承担了购买土地的成本而没有承担因消灭这块土地所导致的各种环境影响对整个人类可能造成的损失的成本。因为,从“地球生物圈”的角度判断,其没有权利进行这样消灭土地的行为。人类活动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也是因为在类似的上述行为中没有意识到环境成本的负担而肆意破坏环境、掠夺自然资源导致了今天的环境恶果。立法中的权力设置应当以人类社会与环境共同完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指导思想,既不能放纵为一己之私而需要由其他人共同承担环境恶化后果的行为,也不能过度限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需求。前者,当某一个体因无限制地破坏环境、攫取资源而导致它必须和其他个体一起承担环境损害成本。但被其他个体均摊后的环境成本只会小于他从破坏环境中取得的收益,所以他会始终反复进行这一行为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环境也将被无休止地破坏下去。后者,当政府投入一定的管理成本过度限制社会公众对环境的需求,社会公众会因生产、生活等活动对环境资源的需求而大规模、集体性地铤而走险。于是,政府将针对这一状况追加更大量的管理成本。对环境的社会公众需求被遏制了,但政府财政大量集中在某一公共部门致使无法以足够的资金满足除此之外其他公共部门为社会提供能够公共物品的服务目标,导致政府职能在整个公共管理领域的缺位。这种结果造成高额管理成本的浪费以及政府职能结构性缺陷,也并非理性的选择。此外,权利配置也需要考虑社会公众之间的均衡。权利是人所拥有的,自由也是人所追求的,但滥用权利并不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正确途径。因为这将使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在社会互动关系中生存的人们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必须考虑自己权利的行使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以及如何在他人权利的行使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永恒命题构成了人们制定行为规范的指导思想并试图阐释在人类社会中的相对的自由。当以为无限的环境资源在现实中成为有限,成本与收益关系就可以对这一非市场行为进行经济分析。

### 参考文献

- [1]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 [2] 道格拉斯·G·拜尔,罗伯特·H·格特纳,兰德尔·C·皮克.法律的博弈分析[M].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1999.
- [3]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 [4] 金瑞林,王灿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5] 韩德培,吕忠梅.环境资源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1.